

社会符号学的功能主义理据

王 遥¹ 李景娜²

(1.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淄博 255091;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摘 要: 社会符号学强调对符号的社会活动和交际功能进行动态的研究。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特征入手, 结合功能主义者 Halliday、Martin 以及 Hodge 与 Kress 的功能主义思想, 研究社会符号学的功能主义理据。功能主义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 一种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 语言同时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多重代码系统, 其核心语义层既体现为词汇语法又体现着社会文化语境, 而这又决定了语言符号的变异性, 也凸显了社会文化语境在语言符号解释中的必要性。功能主义的这些理念与社会符号学的社会性、层次性与变异性特征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 社会符号学; 功能主义; 符号; 社会性; 层次性; 变异性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4)03-0008-05

1. 引言

作为约定指称的工具、信息传递的载体, 符号始终处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 人们感叹于符号的比比皆是, 困惑于符号的形形色色, 于是便开始了对符号本质和意义的追问和探索。符号学的研究源远流长, 而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却直到 20 世纪初才得以正式确立(李幼蒸 1999: 12)。现代符号学的确立主要得益于美国逻辑学家 Peirce 与瑞士语言学家 Saussure 的开创性研究(王铭玉 2004: 78)。Peirce 从分析哲学的高度, 关注符号的逻辑意义和价值功能, 其符号学研究带有较强的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 而 Saussure 则以结构主义理念为指引, 强调符号的结构性和系统性, 并确定了语言符号的核心地位以及概念系统的统一性。两位奠基者的研究明确了现代符号学的理论目标与分析框架, 从而使系统的符号学理论得以初步形成。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新的研究方向, 社会符号学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普通符号学的束缚, 实现了传统符号学语义分析与现代社会语言研究的结合, 不再仅仅是对个体符号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 而是对符号的社会活动和交际功能进行动态的研究, 或者说是一种“对符号系统如何在社会语境中生成意义的功能的研究”(张德禄 2010: 5)。

自上世纪末起,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符号学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符号学方法的引入性介绍以及学科的整体性界定而展开, 如胡壮麟(1994)从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入手, 包括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性与历时性、语言与言语、二元论与对话性^①以及语言杂合性等, 初步探讨了社会符号学的定位与理论渊源。目前的社会

符号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号的多模态考察上, 并由此而逐渐出现了对社会符号学特征的分析性和归纳性总结。张德禄(2010)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社会符号学的六大特点, 即社会性、系统性、可用性、跨学科性、动态性以及多模态性, 类似的提法同样散见于李战子(2003)、胡圣炜(2008)、佟颖(2010)、汪燕华(2010)以及常晨光(2012)等学者的研究中。

本研究以社会符号学的社会性、层次性和变异性三个基本特征作为切入点, 追溯社会符号学研究的功能主义理据, 研究旨在表明社会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和特征与功能主义的思想理念有着相当程度的异曲同工之处, 这可以从功能学派学者 Halliday、Martin 以及 Hodge 与 Kress 的功能主义思想的探讨中得以证明。

2. 符号的社会性

传统符号学倾向于将符号做静态化的处理, 关注于符号的结构和代码, 符号的意义被视为一种内在性的操作, 而符号学则完全成为了一种“探究符号活动本质特征与基本变体的学科”(Hodge & Kress 1988: 20), 这样, 符号的功能性、实践性以及社会性特征就被完全地忽视和抹杀。

符号, 就其本质而言, 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社会过程与社会关系的产物, 在沟通和理解符号的意义时, 社会维度理所当然地应当纳入考虑范围。符号体系是在社会中形成的, 因而社会性正是其根本属性。正如 Hodge 与 Kress(1988: 1)所说, “符号学不应当把社会交际看作是孤立的、个体的现象, 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并对其进行系统、全面和清晰的探究”。

社会符号学关注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以

不同方式互为关联的符号活动,因而往往强调符号意义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与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符号与社会交际密不可分,符号的意义总是通过其社会性得以构建和传递,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反映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乃至社会意识形态,而符号的形式又受到参与者所在的社会组织以及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制约,体现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Voloshinov 1973: 2)。符号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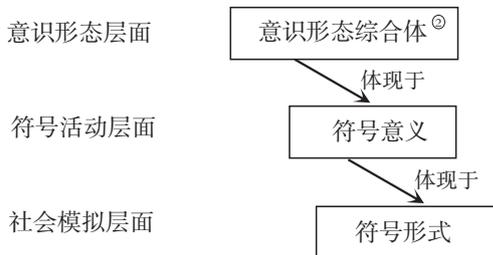


图 1: 符号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关系

意识形态原本就是一系列的信息,其意义在实践中可以得以明确(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决定了符号的内在意义,符号的意义又由于社会交际的具体形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编码方式(符号活动层面),并进而实现对指涉世界的再现或者说现实模拟(社会模拟层面)。换言之,符号之所以具有意识形态表现力,主要是得益于符号活动中的符号交际行为与所模拟世界的符号活动关系的相互作用。

以经验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功能主义学派并不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仅仅由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多层次构成的符号系统加以研究,更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超越语言的本体研究,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功能学派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这实际上是把语言看作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或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表达一定意义的符号系统”(朱永生 2001: F25)。

社会现实自身就是一种意义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符号结构,而语言正是组成社会文化的整个符号系统的关键一分子。Halliday(1978: 12)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在他看来,人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人认识世界和实践于世界的过程,因而也就必然是学习如何通过使用语言表达各种意义的过程,而这也成就了人自身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共享的意义潜势,语言不但是经验的一部分,更是人作为主体对经验识解的结果。Halliday 把语言看作是“社会人”“机体之间”而不是“机体内部”的现象来研究,强调社会文化对语言符号的影响。这意味着语言必

须在社会文化语境内进行解释,社会文化本身作为一个信息系统,支配着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人际语境中意义的交换。因此,人们在日常语言交换中表现出社会的结构,对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加以肯定,并且表达、传递和共享社会的信息。

Halliday 的门生 Kress 进一步明确了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特征。Kress & Hodge(1979)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一书中指出:“语言具有强烈的社会符号性,分析和解释语言不仅仅应从文本和语言结构出发,还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信息和意义出发,这便是社会符号学的分析语言的观点”(李明 1997: 6)。作为组成社会现实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以及非语言符号如姿势、图像乃至声音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因而应当予以同样的关注,正是这一理念催生了社会符号学与功能主义界面研究的结合点——多模态分析。

功能学派强调文化语境对情景语境的制约,并认为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的具体体现形式,而不同类型的情景语境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文化语境(胡壮麟 2008: 421)。Halliday(1978)建立了最初的语域模式,提出了三个语境变量——“语场”、“语旨”以及“语式”,而这三个变量又分别激活了语义系统的三大要素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并最终决定着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在 Halliday 研究的基础上,Martin(1992)为了能够对话语的宏观结构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对文化语境做了进一步的切分,并进而建立了新的语境模型,在语言、语域与语类层面之上补充了更高、更抽象的“意识形态层面”,其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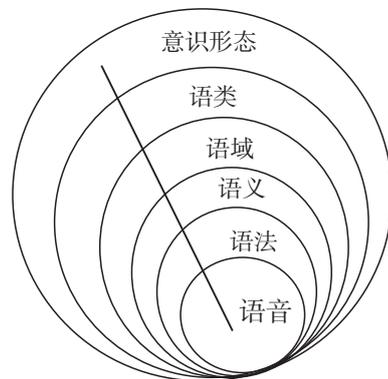


图 2: 语境模型(Martin 1992: 496)

Martin 所谓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构成社会文化的编码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使文化语境以社会符号变体的形式展现给符号使用者。在各层面的关系上,语言、语域和语类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表达层面,而意识形态则构成其他各层面的内容,并决定着符号的最终表现形式,这种功能主义的语

境思想与社会符号学的社会性理念并无二致。

3. 符号的层次性

符号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其编码与解码无法通过对单一符号所反映客观事实的简单提取而进行;相反的,符号的意义存在于整个意义系统之中,符号也只有在整个意义系统操作中才真正具有自身的意义。社会符号学将研究的侧重点从单一符号转移到整个符号系统,关注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符号之间的系统关系往往呈现为选择性特征,符号系统提供给人们一个或多个符号或者符号子系统进行选择;当人们要表达一定意义时,便要在整个系统网络中进行有目的地选择,而当某个符号被选定时,也就意味着某种要表达的语义已同时被选择。

符号的系统性决定了其层次性特征。根据符号的不同性质和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关系,符号系统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与整个符号系统便构成了符号的层次。以语言符号为例,可以划分出四个基本层次:音位、形位、词位以及句位,而根据 Hodge & Kress(1988: 5-6)的观点,在语言的句位层次之上,至少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层面,制约着语言符号在社会文化情景中的特殊表达。

在功能学派看来,语言是一个多重代码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层层相套。首先,语言系统作为一种语义潜势,是一个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其中语义系统的地位是重中之重。语义系统由三个功能成分组成,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体现的是说话人作为观察者的语义潜势,是语言的表达功能,即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以及内心世界的

经验进行编码的语义成分;人际功能体现的是说话人作为干预者的语义潜势,是语言的参与功能,即说话人表达自身态度推断,并影响他人判断和行为的语义成分;语篇功能体现的是说话人构建语篇的语义潜势,概念功能与人际功能最终都是以语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语篇功能成了把语言成分组织为语篇的语义功能。正是在语篇意义上讲,语言的本质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语言的外部。语言的语义系统网络提供的语义潜势最终通过语篇得以现实化,成为语义选择的过程,而语篇本身作为一个非实体性的语义概念,又受制于情景语境;换言之,作为语言系统对语境即社会符号层的体现,语义层可以看做是一个界面,连接着符号编码层和更高层面的符号活动层。

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看作是意义潜势,关注其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在表述语义时,必然要在语言的不同语义功能部分进行相应的选择。此外,语言系统的形式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为了实现不同的语义功能所决定的,因而语言系统的选择也是以实现社会功能为动因的必然要求。

Halliday (1994, 2004) 传承了 Hjelmslev (1953) 的观点,认可语言系统是分层次的。语言系统至少包含内容、表达和实体三个层次,具体表现为语义层、词汇语法层以及音系层,各层次之间有着一种体现的关系,“对‘意义’的选择(语义层)体现于对‘形式’(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对‘形式’的选择又体现于对‘实体’(音系层)的选择”(胡壮麟 2008: 16),这与社会符号的层次性特征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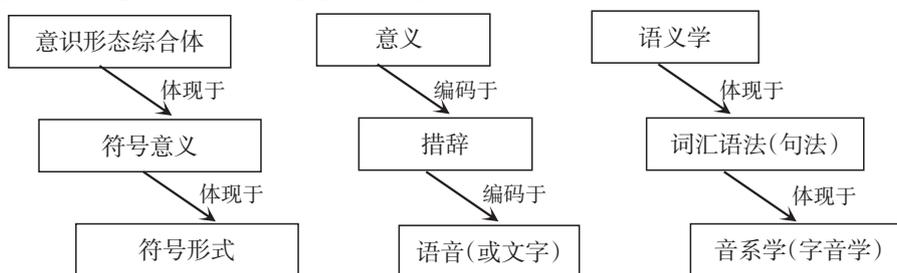


图 3: 符号的层次性与语言的层次性

Martin(1987: 37)同样认可了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与层次性,并将语言符号系统网络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网络、第二层次网络和中介网络。其中,第一层次网络表达形式意义,主要用来描写句法模式;第二层次网络表达的是非形式意义,主要用来进行语境的描写;中介网络则同时涵盖着形式意义和非形式意义,因而可以实现非形

式特征在语言系统中的形式化。与 Halliday (1994, 2004)对语言符号层面的切分基本相同, Martin 同样将语言分为三个层次,即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义^⑥;然而,与前者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相邻层面之间并非是单纯的体现关系,并且“语境和语言之间的体现关系不同于语言内部各层次之间的体现关系”(Martin 1999: 29)。

Martin 倾向于使用“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两个术语来表现层面之间的关系,这样语言就是语域的表达层面,而语域则构成了语言的内容层面;同样的,语域构成语类的表达层面,语类又可以进一步构成意识形态的表达层面。

4. 符号的变异性

符号的社会性属性蕴含着其变异性的特征。符号的意义并非由符号自身的内在属性决定;受其社会性属性的影响,在不同的情境下符号的形式以及意义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在脱离社会情景的情况下,任何单一符号都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说明。符号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下成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体现,符号活动的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因此,符号活动并非是绝对清晰和理性的,不同的情景对符号活动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构成了符号活动的社会条件。社会符号学家以交通灯为例阐明了符号的变异性特征^①。直观来看,交通灯作为一种典型的符号编码形式,三个能指——红、绿和黄,分别指代了“停”、“行”和“慎停/行”的概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对交通灯符号意义的建构和解读涉及到社会阶层、性别以及文化的影响。例如,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绿灯可以是“正常通行”或“确认无行人之后方可继续通行”,黄灯的意义可以是“如果已接近了交通灯就该提速”,或者也可以是“出现了黄灯信号就要减速”,而红灯则因为至少出现了“刚刚变红”和“变红了几秒钟”两个能指,从而具有两种完全不同意义的解读。

功能学派承载的是经验主义思想,重视语言实际而不是逻辑推理,因而是从外部即社会文化的支配和影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的,探究的是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使用真实的语言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因此语言在具体情景语境中的各种变体以及表达的不同意义也就必然受到了功能主义学者的特别关注。

功能主义的变异性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情景语境以及语域理论上。Halliday(1994, 2004)所说的语境概念起源于 Malinowski(1923),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个层面,而功能学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情景语境类型化,把情景语境中的种种因素抽象化,归纳出为数很少的且独立于具体语境而又为所有语境共有的变量,并研究这些变量如何支配语义结构的选择和使用。Halliday(1978: 109)把语境定义为“语篇得以生成的环境”,这样一种特定的情景类型则成为一个特殊的

符号结构,语境因此成了三个社会符号变量——语场、语旨和语式的集合体,三种语境变量分别支配着语义系统的三大元功能,而这三大功能又分别支配语义系统中的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以及主位系统等。语场表现社会过程,体现语言的概念功能,在语言结构上典型性地体现为成分性以及递归性;语旨表现社会关系,体现语言的人际功能,在语言结构上往往体现为超音段性;语式表现符号的方式,体现语言的语篇功能,在语言结构上体现为递增性特征。根据语境变量的具体要求,交际双方在语义系统中逐项进行选择,最后在语言中体现为相应的语言形式,并进一步体现为语言实体的说明项。正是在不同语境变量的作用和影响下,语言符号的意义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并最终形成不同的形态和语音编码。此外, Halliday(1978: 35)还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语言变体:语域和方言。方言是因说话人不同而出现的差异性变体,即“用不同的方式说同样的事”,而语域则是因说话内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变体,也就是“用不同的方法说不同的事”。

其他功能学派学者同样对语言符号的动态性与变异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Martin(1985: 248-274)从过程和语篇两个视角探讨了语义潜势,并指出过程强调的是交际性和动态性,而语篇关注的则是体现性和静态性,语义潜势的静态系统构成语篇,而动态系统则生成过程,无论是静态语篇还是动态过程都是文化语境支配下的意识形态和语境作用的产物,而这也就决定了符号表现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变异性。Hodge & Kress(1988: 8-9)从语言文字和图像声音的反映和创造过程入手,把语言系统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纳入了考虑范围,证明了语言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个符号系统意义的生成与理解都应当放在整个符号体系的框架中进行,一个符号系统无法与其他符号系统相脱离,符号形式以及符号的意义始终处在与其他符号的动态变化关系之中,因此只有将各种符号与社会文化语境建立动态的联系,才能真正地把握符号的内涵。

5. 结语

功能主义将语言视为一种有规律的资源,把语义看作是语言符号和其他符号体系的交集,语言符号的解读是一种涉及思维的社会性活动。Halliday、Martin 以及 Hodge 和 Kress 等学者把社会文化本身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并以符号术语的形式予以体现,其出发点在于强调在社会文化语

境内寻求语言解释的必要性。人们在日常交际中表现着社会结构,而蕴含着语境的语言则实现了社会意义的成功传递与交换。

社会符号学审视的是文化和社团所特有的符号活动,以便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意义的情景语境中,解读符号所构建的各种语篇和意义,其社会性、层次性和变异性的特征与功能主义的根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社会符号学的主旨正是要对社会交际中人们所使用的符号形式以及所表达的符号意义进行研究,符号活动受到社会意义的制约,反映着社会文化的系统层次结构,而社会意义最终又是通过整个符号系统得以动态性地呈现出来。

注释:

- ① 对话性,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交际的社会性与言语的重要性。
- ② Hodge & Kress(1988)所说的“意识形态综合体”,指的是“功能上相互关联的、由对世界种种矛盾看法所组成的集合,它由某个社会集团出于自己特别的利益而针对另一集团强行施加,或者由另一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试图进行抵制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转引自霍奇 2012: 3)。
- ③ Martin(1999: 29)倾向于使用“话语语义”这一术语而不是“语义”。
- ④ 实例转引自 Hodge & Kress(1988: 38-39)。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 [2]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 [3] Halliday, M. A. K.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 [4] Hjelmslev, L. 1953.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5] Hodge, R. & G. Kress. 1988. *Social Semiotics*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6] Kress, G. & R. Hodge. 1979. *Language as Ide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 [7] Malinowski, B. 1923.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C] // C. K. Ogden & G.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96-336.
- [8] Martin, J. R. 1985. Process and text: Two aspects of human semiosis [C] // J. D. Benson & W. S. Greaves.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Volume 1: Selected Applied Papers from the 9th International Systemic Workshop*. Norwood: Ablex: 248-274.
- [9] Martin, J. R. 1987. The meaning of feature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C] // M. A. K. Halliday & R. P. Fawcett. *New Development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London: Frances Pinter: 14-40.
- [10] Martin, J. R. 1992.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1] Martin, J. R. 1999. Modeling context: A crooked path of progress in contextual linguistics [C] // M. Ghadessy. *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5-61.
- [12] Voloshinov,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13] 常晨光. 2012.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视角[J]. 当代外语研究(3):18-21.
- [14] 胡圣炜. 2008. 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征兵海报的视觉分析[J]. 外语研究(4):21-25.
- [15] 胡壮麟. 1994. 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9-57.
- [16] 胡壮麟. 2008.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霍奇,克雷斯. 2012. 社会符号学[M]. 周劲松,张碧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 [18] 李明. 1997. 社会符号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J]. 上海科技翻译(4):6-9.
- [19] 李幼蒸. 1999.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 李战子. 2003.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5):1-8.
- [21] 佟颖. 2010. 社会符号学理论溯源[J]. 外语学刊(6):142-144.
- [22] 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3] 汪燕华. 2010. 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社会符号学理据[J]. 外语学刊(6):145-147.
- [24] 张德禄. 2010. 适用性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5):5-10.
- [25] 朱永生. 2001. 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导读 [C] // M. A. K. Halliday.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F22-33.

收稿日期:2014-02-12

作者简介:王遥,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
李景娜,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李德俊)